

行雲流水一任天機

——父親顧頡剛的治學方法

● 顧 洪

一生讀書最惡附會

父親顧頡剛先生一生治學，勤於作讀書筆記；從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起，至一九八〇年（民國六十九年）逝世，一直沒有間斷過，六十多年來積累了近二百冊筆記，共三、四百萬言。

父親一方面用它搜集材料、思考問題，作為撰寫論文之基礎，一方面繼續錄下新發現的材料和新見解，補充以往論文的不足，甚至改變某些觀點；不斷深化自己的研究。他曾談到論文和筆記的區別及聯繫：

「論文篇幅長，易生燕累」，「筆記者，或長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簡潔之美。其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記錄人言，其態度可以嚴肅，亦可以詼諧，隨意揮灑，有如行雲流水，一任天機。此學術界之小品文也」，「為筆記既多，以之匯入論文，則論文充實矣，作文既多，以之灌於著作，則著作不朽矣」。（浪口村隨筆油印本序）他的讀書筆記已成為他全部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

父親自幼讀書喜歡獨立思考，常把自己的主

張批在書上，「逢到書端上寫不下，便寫入筆記簿裡」（《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下稱自序》。「每從父、祖案頭獲見因學紀聞、日知錄諸書，愛其時出新義，勝於舊注；謬欲效顰，立冊以備發揮」（《史林雜識小引，下稱小引》。早年常備有兩種筆記簿：一種便于攜帶的「袖珍筆記冊」，專門鈔撮見聞或偶然會悟的見解，有時則以紙片代替；另一種是正式的「紅格筆記簿」，即印有紅格的毛邊紙線裝簿冊，作為最後釐清的筆記簿。

這種記錄方式保持到以後。抗日戰爭前的一部分筆記，即因人事冗雜，不暇檢冊子，率書單頁紙上，置于木盒中，七七事變突起，他因宣傳抗日受到通緝，匆遽離京，此盒遂不知去向，父親每念及此，輒歎惜不已。

起初筆記內容不拘一格，幼年有一段時期看戲成了癖好，作過論劇記，「居然有始有終地寫了好幾冊。後來讀書方面的興致漸漸超過了看戲的興致了，又在論劇記外立讀書記」。（自序）現存兩冊一九一三年所記檀痕日載，大約就是論劇記的一部分。另存一九二〇年所記游觀雜記一冊，專記游覽北京西山及雍和宮。前面提到的讀

書記，為一九一四年正式所立的讀書筆記。在其第一冊——寒假讀書記首頁上寫道：

「余讀書最惡附會，又最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苟自見于同輩，或將謂我為狂。……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一切影響皆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為學術書籍人心世道之彞。」

這段文字被引入《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它概括了父親一生讀書的宗旨。

父親早年的讀書筆記沒有什麼中心，至一九二三年，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始專力治古史，筆記內容逐漸成為有系統有目的性了。對於起初幾年的筆記，他自己評價說：

「到現在翻開看時，不由得不一陣陣地流汗，因為裏邊幾乎滿幅是空話，全沒有自己學問上的建設。但一冊一冊地翻下去時，空虛的漸漸變成實質了，散亂的也漸漸理出系統來了，又漸漸傾向到專門的建設的方面了，這便使我把慚愧之情輕減了多少。因此使我知道，學問是必須一天一天地實做的，空虛和荒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個階級；惟其肯在空虛和荒謬之後作繼續不斷的努

力，方有充實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現在所承認為滿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過了十年再看也還是一樣的羞慚流汗。所以我對於我的筆記簿始終看作千金的敝帚。」（自序）

他堅信學問是一點一滴積累而成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無頓悟的奇蹟，因此立志用全力在細磨功夫上，摒絕僥倖取巧之心。後來他總結自己的治學得益於筆記說：

「所以尚能從事於考索之業者，只緣個人習性樂於遇事注意，而此腕又不厭煩，一登於冊，隨手可稽，予蓋以鈔寫代其記憶者也。」（小引）可見作讀書筆記正是父親治學的重要方法和鮮明特點。

疑古辨偽清理經學

父親曾多次說到，他一生治學目標，就是「對於戰國、秦、漢時代學說之批判」。縱觀全部筆記，其內容都與這一主題緊密相關。

父親認為，研究歷史第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為探究古史真面目，他對尚書、詩經、史記及左傳、論語、孟子、墨子等書用力最勤。

筆記中長期注意蒐集有關尚書的性質、名稱、篇目、亡佚情況、傳本、語言文法、歷代研究等方面的材料。除直接材料外，還摘錄了許多用以比較研究的間接材料。三十年代初，在燕京大學編尚書研究講義，着力于堯典，作了大量札記，以證明它始於戰國，修訂于漢武之世；五十年代初，在上海誠明文學院教授尚書研究課，正值史學界討論西周社會性質問題，他決心將尚書

澈底翻譯出來，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史中的一個課題供給確實可靠的材料，故對周書諸篇的道德觀念、等級制度、語言文字等方面頗下工夫。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將「尚書今譯」納入出版計畫，為超過三十年前譯盤庚的水平，特立讀尚書筆記，從多方面潛心探研，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起，共成七冊。

父親早在二十年代就發表過研究詩經的文章，稱它「可以算作中國所有的書籍中最有價值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以後仍不斷探討和極力恢復其古代樂歌的本來面目，筆記從宋書樂志、樂府詩集、古詩十九首等書中摘錄了不少樂歌，還搜集了古今樂曲和戲曲的演奏與唱法，進行對比，尋找周人樂詩在起興、和聲、重疊、尾聲等方面的規律，以及徒歌與樂歌的關係。五十年代為整理出版姚際恒詩經通論，亦作了大量札記。

父親在三十年代標點過史記。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又應中華書局之邀標點史記，更將其精讀一遍，就史記的來源、體例、傳本、舊注、後人增改和評價，司馬遷行年以及如何進行現代標點等問題廣蒐博徵，留下不少精闢的議論。

父親始終重視周秦諸子及左傳、大戴禮、國語等典籍中的古史傳說，並認真辨析諸說異同、之間的聯繫和演變的原因，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作具體的論證。筆記所輯有關黃帝、少昊、唐堯、虞舜等古帝的材料尤多。如對於少昊氏，他早年集材，重在論證少昊金天氏是王莽劉歆之徒為改朝換代的需要硬插進古帝王系統的

；後期深入研究尚書中的鳥夷族，集材說明少昊為東方民族鳥夷的宗神，亦是其崇拜的鳳鳥圖騰。不同時期側重點不同，研究的方法和材料都有新的突破。

父親從小喜歡看戲，受到戲劇故事變化的啓發，很早就有志于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為系統的敘述。除有關京、崑及各種地方劇種藝術形式的札記外，筆記中更多地記錄了各種戲曲故事，以及不少中外神話傳說，從中尋找故事變化的背景及規律。他對民間的鬼神信仰、婚喪巫術等風俗十分重視，冀圖以此說明古史傳說的形成，揭示古代社會的真面目，同時也為戲曲發展史、民俗學等研究聚集了豐富的資料。

古地理與古民族的札記，是筆記的又一重要方面。如果說，關於古代疆域觀念，古代州制，華夏民族的形成與古代蠻夷戎狄的關係等方面的材料較多地體現在一些重要論文中，那麼，對於傳說時代的地理、古代郡縣、都邑及古民族的札記，則反映了父親不斷深入的思索和研究。一九五三年，上海地圖出版社委託他與章丹楓先生合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九五七年與侯仁之、譚其驥等先生一起編輯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這期間集中考慮了有關傳說中堯舜禹的生卒地及活動區域、夏商周三代都邑及疆域的問題。

例如夏代疆域，他認為其中心應在河南南部，而後擴大至山西。又從西北多「大夏」之名推斷夏代的西境以及夏亡之後夏人活動區域西移的跡迹。

對鳥夷族活動區域及遷徙分化情況，是父親後期着力研究的課題。他將古文獻、古文字和民族學的材料融會貫通，說明其為古代中國一大民族，曾佔有沿海一帶，跨禹貢揚、豫、青、徐諸州，延及冀州者則為夫餘；風偃嬴嬌等姓皆其分支；唐、虞、商之為東夷，亦即鳥夷；周公東征之攸國亦為鳥夷之一。

這部分札記的內容，在文獻範圍之外更有實地考察的心得。抗日戰爭時巡遊甘肅、青海，以臨夏小積石山證之禹貢「導河積石」必為此山而非今青海之積石山；六十年代初歌夏呼倫貝爾，三至草地，以牛羣的蕃養情況證之詩經「騶牝三千」為古人大量蕃養牝牛馬。他曾說：

「考據之業，搜集書籍證據，以多為勝，此清人之成法也。……予性好遠游，從實生活中發見可以糾正前人成說者不少，于是超出都市而入農村，超出中原而至邊疆，以今證古，足以破舊而立新，較之清人舊業自為進步。」（湯山小記三序一九五七、六）

這是對自己研究方法的公正評價。「名物制度」為傳統經學的一個重要方面，父親以新的觀點和方法，留下許多精彩的議論。他主張以淺近民族之禮來研究中國古禮的產生及其內容，對古代宗法、祭祀、田賦、兵刑、官爵等制度給予新的解釋。

他將曲禮之天官系統與周禮官制進行對比，搜集中外古代巫祝之地位由尊而賤的材料，證明曲禮以天事為先，人事為後之說，必非作者之想象，視周官、洪範更符合于古代之實際。

他注意搜集姓氏稱謂方面的材料，尋找姬姜似已姚嬴諸姓間的關係，以探究古代民族的來龍去脈。

父親青年時期曾編輯清代著述考，尚未作完，筆記中還在繼續蒐集。自從以全力從事考辨古史之業後，更以疑古辨偽為中心，闡述經學的大勢與今日的任務，輯錄歷代學人及其著述情況，以便對經學作一總的清理。筆記中還保存了不少他對古籍整理的設想和意見、各個時期的工作計畫以及古史研究課題；保存了一些因戰亂或政治運動而損失掉的往來論學書札，它們是古史研究及近代學術史的寶貴資料。

由于父親出生于江蘇蘇州，故筆記貫穿了吳中史蹟、地理、文藝、風俗、人物、史志諸方面的內容，形成讀書筆記的獨特風格。

知者所短 愚者所脩

父親一生追求專心讀書治學的生活，時常為自己多讀書、多作筆記而欣喜，也為忙于人事應酬或因戰亂干擾荒疏了筆記而惋惜。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八、九年裏，在燕京大學任教。三〇年，他銳于思辨，急欲立一系統，故有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一文發表，當時所記，皆就想到問題匆遽間寫數行，使無遺忘而已。次年全力研究堯典，聯帶研究漢史及詩經；而欲採禪讓制則必先及世官制，故對左傳資料亦多擷取。那時的筆記，最短兩三天即寫滿一冊，學問可謂勇猛精進。

抗戰中輾轉于西北、西南，無法再作系統的

研究，筆記多有間斷，或一兩年才寫畢一冊。那段時期不少冊的序文中都流露出對日本侵略者的怨憤之情。

一九四八年底，至上海大中國圖書局任編輯工作，結束了一時期內教課、交際的忙亂生活，按日讀書寫作，心有所得，又作札記。

五十年代初任職較多，又歷各種政治運動，讀書時間有限。五三年元旦，因養病得覽書，時有新得，癒後一一寫入筆記，一月之中竟得兩冊，使他驚歎：「此予三十年前之生活也」（法華讀書記八序一九五三、三）

一九六四年一月，携書稿于北京醫院病房中作記。醫生護士每加勸阻，老友王伯祥先生亦移書相勸。為此他說：「良友之言，安敢不受。特予讀書已成癩癖，非此不愉，而筆記則猶行雲、流水，隨筆書寫，異於為文之集中精神。苟並此而不為，我之為人將如行尸走肉者幾希矣。」（愚脩錄九序一九六四、十）筆記之于父親，如空氣陽光之于生命，須臾不能相離。

父親珍愛自己的筆記，精心為之命名。其中多以彼時所居之地名者，如「瓊東」、「景西」兩雜記，即因二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學工作時寓所處景山北海間而得名；「鄰居雜記」得名于三十年代生活的海淀燕京大學；抗戰期間曾遷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因有「浪口村隨筆」；五十年代初寓于滬西武康路，地近法華鎮，故成「法華讀書記」；五七年養病于京北小湯山，因有「湯山小記」。亦有以彼時主要研究內容命名者，自一九五四年秋起，在北海畫舫齋得性軒內標點資治通

鑑，故成「得性軒讀鑑記」；前文提到的「讀尚書筆記」亦屬此類。更有以彼時心境命名者，一九二四年初立泣續循軌室筆記，三十多年後回憶道：

「余自知治學，即欲按計畫讀書，不幸五四運動後新刊物大出，而余略能文，遂為編輯人組織目標；刊物既頻見余名，社會對於余之要求遂日切，而余乃無日不在茶酒宴會之中。此非玉成余，實毀裂余也。因自標居室為「泣續循軌」，謂己之生活太無軌道，泣而續之循，所以祈人之見舍也。……題此一名，亦唯以自警而已。」（泣續循軌室筆記一序）

一九五四年自滬遷京後，思業務繁重，而年已過六旬，遂立緩齋雜記道：

「念十餘年前，識貪多務得為不寐病之根源，求精神之弛放，曾自署曰緩齋，遠師西門豹佩韋之誼，爰仍拈此字以名寓中書室焉。」（緩齋雜記一序一九五五、八）

七十歲時，援淮南·脩物語「夫學亦人之砥錫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立冊道：

「淮南王諱『長』曰『脩』。予自念所短長，則口說為短，筆書為長。知其長而善用之，則秉質雖愚，亦可藉勤學而與知者較一日之勝負矣。因題其端曰愚脩錄。（愚脩錄一序一九六二、十二）爲了振奮垂暮之年的進取之心，又立高春瑣語，取高誘注淮南。天文之「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語：

「惟日之就暮，猶不廢勞動，以適應治生之所需，此則余汲汲顧影而不欲自棄之心情也。」

高春瑣語一序一九六六、六

足見其以讀書筆記督促自己用功的良苦用心。

父親隨手作記，亦不無規律可循，他常常將篇幅長者書于前，其短者列于後。因此一冊筆記往往前面是各種古史問題的較為系統的札記，後面數頁則是有關戲曲、民俗、掌故等零碎記錄。有的冊子餘下數頁空白，若干年後又拿來使用，不求內容之連續，但求記滿。所以有些簿冊中的條目（特別是後面數條）記錄的時間不一定全與立冊的時間相符。

學問累積似接力賽

父親從五十多歲以後，就時常考慮筆記的整理工作。他認為筆記的功用，不僅在於個人學問的積累，還是一門學科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他說：

「凡是人的知識和心得，總是零碎的。必須把許多人的知識和心得合起來，方可得着全體。筆記者，個人至瑣碎之記錄也，然以其皆真實不虛，故其用至廣。以小說史言之，有俞樾之小浮梅閒話等，於是有魯迅之小說舊聞鈔，於是撰小說史者得有基礎之材料。以經學言之，有臧琳之經義雜記等，於是有蔡啟盛之皇清經解檢目，於是欲綜合歷代經說求出一結論者得有基礎之材料。必有零碎材料於先，進一步加以系統之編排，然後再進一步方可有系統之整理。」（此江市隱雜記三）

父親視治學如接力賽，若系統的整理工作及

身不能完成，亦可將自己手集之資料交予後輩，成爲他們研究之基礎，「一人之力至薄弱，獲他人之助便可擴大至無限」。（緩齋雜記六序）

父親還認爲讀書筆記是一種傳統的著述方式。他在後來寫在法華讀書記第一冊的序中說：

「……迄今四載，將二十冊矣。雖無可觀，亦少留思想上之陳迹。此譬猶地質學家之檢拳石，考古學家之拾片瓦，自他人觀之盡廢材也，而就檢拾之者言之，則苦心存焉爾，期望存焉爾；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書豈伊自爲，亦承夢溪、客齋之緒也。是固我國文體之一種，證據欲豐而辭句欲簡，脫不廢整理古史、古籍之業者，其體實終古而長存。予之書苟能步武亭林，於願足矣。……可見他將作筆記既當作一種治學方法，又成功一種著述體材。

父親的部分筆記，生前曾經發表。其中未經整理、直接刊登于報刊上的較爲集中者有：二、三十年代小說月報十四、十五卷的部分期號上及文學季刊、文學兩創刊號上有關詩經、戲曲、詩歌的札記；四十年代中期文匯報「史地專刊」所載抗戰期間寫成的地理、風俗等方面的筆記。此外，經整理發表者即浪口村隨筆以及由此精心雕琢而成的史林雜識初編。

數十年始磨成一書

抗戰初期父親在甘、青地區接觸蒙藏回等少數民族，以彼地之風尚考證中原古史，隨手作記。一九三九年爲避敵機轟炸，遷居昆明北郊浪口村，頗得閑暇，便將日前聞見證之故籍，寫成浪

口村隨筆三冊。次年移居成都，求書不難，遂將其潤飾成篇，冠以篇題，分期發表于齊魯大學善半月刊。抗戰勝利後返滬，將戰中所記再為排纂，按文字內容分成地理、制度、名物、史事、文籍、邊疆六卷，題以「浪口村隨筆」，油印百冊分贈友好。

一九五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擬取以出版，父親時已遷京，顧數年來對此中諸問題多有新得，復書請緩期以待重寫。次年赴青島休養，以一月之力統整一遍，並與諸友人商討；六〇年冬，抱病「倚枕斟酌，至于再三，先揀其大致可作結論者五十四篇，輯為初編」。(小引) 真可謂二十餘年磨成一書！

父親曾設想將全部筆記依照此法分類重行刊布，順次出版「二編」、「三編」……一九六〇年至六二年，他集中專門時間，將以往的筆記進

行初步整理：第一，劃定範圍，把一九一九年九月所記之寄居錄作為起始。第二，擬訂了絕大部分筆記的篇名，並在一些簿冊前補作了序文，在這期間，僱人分冊分條謄鈔，便于以後按專題歸類重寫。

他還向學術界的朋友徵求整理筆記的意見，其中在河北大學圖書館工作的于鶴年先生是比較重要的一位。

一九六六年以前，父親將筆記鈔件分批寄往天鶴年津于先生處，請代為整理。

「文革」事起，此工作受阻，一九七二年前後，于先生粗加分類，就一些專題擬訂提綱，並

在一些鈔件上批了修改意見，惜彼時于先生疾病纏身，無力再作進一步的工作，遂陸續將鈔件寄回。父親收到後亦在部分鈔件上隨手批閱，修訂

或總結前說。

生命終點仍有遺憾

歲月蹉跎，十年瞬逝，「文革」結束時，父親已是耄耋之年了。他多次對我談到死不足懼，只是工作沒有做完，心中還有十幾篇文章沒有寫出來。我深知這種痛苦將伴他走到生命的終點。

一九八二年秋，我開始整理筆記的工作。由于他已辭世，不便按照編輯史林雜識初編的方式繼續編下去，而是以時間先後逐冊順序補齊，核對了絕大部分引文，刪併了少量內容重覆的條目，基本上保持筆記的原貌。

父親生前多次說到，文集應當親訂，以減少錯誤。然因工程太大，終未如願，確是極大的遺憾。我雖學力有限，但竭盡全力去做，力求把錯誤減少到最低限度，以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

聖文庫戴笠新傳

費雲文 著
全一冊定價貳佰元精裝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的幾個戰場⑪戴笠軼事⑫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精裝三百元，聖文書局出版，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